

资讯

与托克维尔一起旅行

编译/黎文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31年的美国之旅可能是政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旅行了，他从法国启程，花了9个月游历观察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写下这部经典著作。

然而美国只是这位旅行家记录的诸多地方之一。托克维尔坐帆船、乘火车、有时跨上马背，或是靠着自己的一双脚，穿越了欧洲、北美和北非。新大陆是他的第二站，他第一次国外旅行是去意大利的西西里。而在美国之后，他又很快去了英国、爱尔兰，还有德国、瑞士。他所到最“异域”之处是阿尔及利亚。

近日，伦敦国王学院政治学教授杰里米·詹宁斯的新作《与托克维尔一起旅行……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詹宁斯利用托克维尔的往来书信、发表的著作、演讲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重建了他极具勇气的游历。

托克维尔是一个旅行狂吗？詹宁斯介绍说，在飞机还没有发明的年代，旅行可不如今天这么容易，托克维尔有很大一部分行程是靠坐船，而他偏偏严重晕船，但即使一路生病也阻挡不了他上路。托克维尔其实也非常享受旅行，需要旅行，但他非常喜欢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不过他在写作上有一项坚持，就是一定要实地去考察，与当地入交谈。他其实也很想写印度、写俄国，但因为没能亲身去这些地方，便未曾下笔。这位严谨而刻苦的暴走族，在旅途中通常会一早就起床，每天不是见这个人就是要去某个地方，随时随地都在做笔记——他觉得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也是他一路劳累生病的原因。

尽管一直病怏怏的，肩负的政治责任也不断加大，托克维尔从未停下脚步，从未中断学习。他想了解各种社群如何运转，所依凭的是哪些习俗风尚，而精英与大众又如何适应社会与经济的急速变化——例如，他们如何应对民主和工业革命的崛起，如何看待帝国的扩张。他对魁北克有序的、天主教主导的社会称赞有加；他批判了德国沸腾而危险的沙文主义政治；他为英国着迷，去了三次，这里贵族制度运行良好，还发生了工业革命，他认为英国是地球上最自由也最不平等的地方；爱尔兰的贫困让他深感遗憾；他去过阿尔及利亚后，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期盼法兰西重建帝国。这也是他一生中极具争议的地方。托克维尔这些不为人知的旅行背后，暗藏着比较政治方法的起源。

实际上，詹宁斯不仅为这位19世纪的法国贵族写了思想传记，他对托克维尔的密友、政治学家古斯塔夫·德·博蒙也着墨颇多。1850年，托克维尔患上肺结核（九年后因此病去世），于是携夫人一起去意大利疗养。他给博蒙写信说，意大利“无与伦比的美丽”，但是意大利人民啊，“难以想象的污秽，衣衫褴褛，形容卑劣”。托克维尔还说，人们必须去“阿尔及尔最可怕的街道，才能找到像那不勒斯的街道上每时每刻都能看到的那样肮脏的东西”，“翻遍法语词典，我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体现我心中的怜悯和震惊”。

詹宁斯专攻法国政治思想，是《剑桥法国思想史》的共同主编之一。他说自己自小是个法国迷，而托克维尔是法国转型时期的一个人物，总是有很多新的想法和表达，于是他一路随行，向大家展示托克维尔性格中未被重视的方面，重释他的政治和文化评论的深广度。



建筑的思想史

人文视野下的砖瓦楼台

王启元

历来讨论中国建筑，多由经典建筑学角度展开。乐嘉藻、朱自芹、梁思成、刘敦桢、童荷等等，皆对中国建筑，尤其是古代传统建筑的生发历史与风格样貌，做出相当丰富的阐述。建筑是一门工艺、风格、功能的学问，同时带有强烈的内在表达与思想寄托，体现设计者、建造者所处地域、文化的不同特质。近来，学界开始逐渐在建筑史研究中加入人文学科的线索，建筑学思想史、建筑史学史、建筑与国家等诸多话题，逐渐成为热点。普及性建筑文化作品也应运而生。建筑及建筑学，得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共知识，如中国古建中的“亭台楼阁”或是“五脊六兽”，或是西方建筑的罗马风、哥特、巴洛克等风格，逐渐深入人心；这种知识积累无疑有助于更好了解身边的建筑与城市，生发建筑人文的思考。建筑可以是片段砖瓦、十里楼台，也是一段段具体的因缘，承载了人们的寄托与想象。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振复教授推出新作《建筑中国：半片砖瓦到十里楼台》，正是用人文学者别样的视角，带领读者认识中国古典建筑文化。

王振复先生深耕文学美学之外，涉猎广泛，尤其对建筑美学为代表的建筑人文领域，颇有建树。在这本《建筑中国》之中，他以中国建筑门类及微观建筑构件为上下编，为读者呈现千年之内中国古典建筑的规制、工艺与审美。古罗马建筑史家维特鲁威最早提出建筑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作者在书中也提出自己的建筑审美标准三大境界，“可观、可悟、可悟”，如前言中引欧阳修“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的境界即可观、可悟的表现，便是人文与建筑交互的最好例证。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说，自开天辟地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建筑艺术“向来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书”，人们最早把需要记录而不易记忆的信息，都刻在了当时最为坚固与永恒的建筑物上。最早的纪念物只是普通的石头，以至石垣坟冢，之后建筑上的廊柱、拱券、方尖塔组成的建筑语言，按照一个时代的一致观念写出了最好的“书籍”，累世成为每个时代最好的建筑。直到十五世纪古腾堡西方印刷术普及前，建筑艺术一直是最主要的创作形式，因为人类的宗教崇拜生前的原因。

尽管一直病怏怏的，肩负的政治责任也不断加大，托克维尔从未停下脚步，从未中断学习。他想了解各种社群如何运转，所依凭的是哪些习俗风尚，而精英与大众又如何适应社会与经济的急速变化——例如，他们如何应对民主和工业革命的崛起，如何看待帝国的扩张。他对魁北克有序的、天主教主导的社会称赞有加；他批判了德国沸腾而危险的沙文主义政治；他为英国着迷，去了三次，这里贵族制度运行良好，还发生了工业革命，他认为英国是地球上最自由也最不平等的地方；爱尔兰的贫困让他深感遗憾；他去过阿尔及利亚后，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期盼法兰西重建帝国。这也是他一生中极具争议的地方。托克维尔这些不为人知的旅行背后，暗藏着比较政治方法的起源。

实际上，詹宁斯不仅为这位19世纪的法国贵族写了思想传记，他对托克维尔的密友、政治学家古斯塔夫·德·博蒙也着墨颇多。1850年，托克维尔患上肺结核（九年后因此病去世），于是携夫人一起去意大利疗养。他给博蒙写信说，意大利“无与伦比的美丽”，但是意大利人民啊，“难以想象的污秽，衣衫褴褛，形容卑劣”。托克维尔还说，人们必须去“阿尔及尔最可怕的街道，才能找到像那不勒斯的街道上每时每刻都能看到的那样肮脏的东西”，“翻遍法语词典，我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体现我心中的怜悯和震惊”。

教、哲学、思想都希望流芳百世，而石头比书稿更为坚固耐久。

《巴黎圣母院》中这段经典的西方建筑思想史描写，是为了衬托跳出中世纪建筑与教会束缚的时代与人们所迸发出的激情与勇气。西方的古希腊神庙、古罗马竞技场，抑或哥特式的教堂，直到巴洛克的议事厅，正对应古代西方“石头上”的思想史。我国东方木构为主的建筑之中，同样蕴含相似的“木石上”的思想史；中国的古典建筑与城市，从规划到设置，也体现出不同时期的思想精神。

今天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发现，中国早期城池的建设是优先按照某种理论，而非实际居住需要建设的。战国间流传的《考工记》一书记载周朝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虽然细节尚无法还原，但这种严整的规划，可以通过许多同时期的古代城市考古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建筑中国·古城悠悠》）。其《三礼图》中描绘的理想王城规制，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祭祀皇族的太庙和祭祀天地的社稷（坛）分居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与宗族、信仰开始混一，并为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定下大体。但这种“九经九纬”与“左祖右社”显然不全是西周居民及统治者生活生产所需，而是严格遵从《周礼》及相关礼教制度的演绎与外化。

从先秦到汉魏甚至再往后的时间里，这套传说中的“匠人营国”的都城布局，长期成为附会古制的君王优先参考的理论，并在《考工记》此段的规划思想上不断改进。古典中国都城的发展与延续，是沿着西周周制与早期儒家治国理想逐渐发展而来，体现早期中国礼制的思想史主流。汉末大经师郑玄《大司乐》的“圜丘”之说而成“圜丘礼”，重整了经汉学的祭祀系统，为后世祭天建筑立下范本，即今天中国大地上的祭天建筑遗址“圜丘坛”。圜丘坛无疑便是一段古代君主与“天”互动的思想历程，这段思想史体现的正是郑注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六天”“郊丘”诸说，而保留在今天各处祭天建筑遗址旧迹之中。

中国城市规制与思想史的变化，大体也是同步的。当以三礼图式都城设计及战国秦汉高台建筑为代表的早期都市失去活力的时候，也正是

中国思想史中经汉学逐渐开始没落的魏晋时期。此际，佛教的思想与相应的建筑、雕塑、艺术源源不断从西域与健陀罗传入中国。佛教并没有取代之前的中国主流的本土思想，而是最大程度地融入了中国文化；而佛教元素的建筑，同样补充了中古以来中国建筑的思想史。六朝之后的都城与皇宫，加入了许多佛教元素的建筑样式与装饰。北魏洛阳城南北大道道边便是著名的永宁寺与塔，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竟崇山中之影”，北魏洛阳城开始体现中国建筑思潮的多元时代。这以后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所体现的佛教思想史内容则更为丰富，研究者指出隋文帝杨坚以君主名号命名都城及其背后的佛教转轮王信仰，以及信徒君主终极理想中“须弥山”式的城市布局，能为今天重视隋唐长安城所体现出的时代特色与思想寄托提供别样的视角。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与建设，成为整个思想史的缩影与线索。

建筑构件同样是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最为重要的标识之一，林徽因就说过，中国古代历次朝代更迭，饱受外来影响并发生改变，但是“中国建筑直至成熟繁行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丢掉它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林徽因《清式营造则例·绪论》）。在她看来，中国建筑之所以能够保留其独立系统，是因为中国建筑始终保留着若干独立建筑构件集合而成的体系，而她提到其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构件，从地面到空中分别是：台基部分，柱梁或木造部分，及屋顶部分。只要此三者同时出现，并延续中国建筑风格，便是中国传统建筑。

台基无疑是古典建筑最基础的部分，典籍记载与实物出土都出现得特别早，文字早至《尚书·大诰》“若作考室既底法”中便已提出，实物则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安阳晚期殷都城建筑遗址。不过早期台基图案轮廓至为简单，其外观颇显性的引进来自佛教输入后的须弥座式的引进。这种来自健陀罗佛教造像的元素，很有可能与古希腊建筑有相当的联系，

为中古以后中国建筑台基纹饰带来了决定性影响。而柱梁及架构部分，除了著名的“墙倒屋不塌”的构架外，最为人熟知和叹服的便是架构与屋顶间斗拱部分，历来谈中国古典建筑的精髓所在。而在这三要素之中，最为中国建筑独有，且为国人熟悉的无疑就是传统建筑的“大屋顶”。

中国大屋顶结构不仅有大气美观的外形，还蕴含古代工匠复杂承重的智慧结晶，为中国古代科学与美学合璧的高峰。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建筑出现了庑殿、歇山、攒尖、悬山、硬山、卷棚等多种屋顶形式，和重檐屋顶结构，并利用各种屋顶形式的组合，创作出了不同功能的建筑作品。歇山顶因其规制严整庄严，在大型公共建筑，尤其是高规格建筑中运用非常广泛，存世也因之颇为丰富。歇山顶分单檐与重檐，这取决于建筑背后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安门、故宫太和门、保和殿、乾清宫等明清宫城建筑，皆是重檐歇山顶；而采用单檐歇山顶的宫殿、国家祠庙、寺院更是不计其数。而重檐歇山顶之上，还有规制最高的重檐庑殿顶，现存的中国古建筑中，故宫内最大的金銮宝殿太和殿即此种殿顶（《建筑中国·屋顶制度》）。

不仅屋顶本身，屋顶构件上哪怕细小的部分，无不透露着森严的等级。如今今天广为人知的“五脊六兽”，庑殿或歇山顶屋脊上的各种脊兽装饰，不仅有审美的作用，一如梁思成先生所说“使本来极有趣味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檐上脊兽数量、大小、工艺同样体现了这幢建筑物的身份。一般来说正脊、垂脊上实际上蹲着不止六兽，其中最生动的要属垂脊上的一排蹲兽“小跑”；故宫太和殿上“十全十美”的蹲兽门，从檐外“骑凤仙人”开始后面跟着龙、凤、狮子、天马等十件异兽，除太和殿之外，“小跑”兽数必须是奇数，自九以降。同时，在美观与权力之外，脊兽也寄托了建筑主人不少超越性的理想，如祈求神明保佑平安，以免意外、火灾等等庇护理念，脊兽们的形象选取、颜色选择与烧制工艺都有相当的讲究。如直接负责防火的小兽，便有“龙”“海马”“狻猊”“行什”等，投射出木构建筑独有的需求。相比而言，古代平民及低阶官吏

没有资格建造歇山以上屋顶的建筑，大部分亦无处安放小兽；“大屋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本礼制的“说明书”。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自中古腾飞，两宋达到高峰。今天国内可见最早的木构建筑在晚唐时期，为五台山上的南禅、佛光二寺的大殿；在日本则有多处仿唐的古建尚巍然存在。宋、辽以来留存甚多，且宋人刊印《营造法式》，详细绘制北宋晚年官式建筑图样流传。近世以来，木构建筑工艺进一步纯熟，但限于材料及需求的扩大，建筑气象也较唐宋卑弱。清代木构建筑存世最多，体类最为丰富，是今天研究中国古建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正如雨果所说的人类思想解放之后，建筑承载思想史的作用被彻底取代，古典风格建筑的生命随之迅速枯萎，“它基本上已经不再表现社会”“从真实的现代作品一变而成为仿古的赝品”。西方罗马风、哥特式建筑如此，中国古典木构建筑同样如此，清代以来木构建筑发展的停滞与衰落即是例证。不过中国传统建筑在工艺与整体上的美，仍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近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者如常盘大定、伊东忠太、关野贞、喜龙仁、恩斯特·柏石曼等，陆续来华考察古建，带回无数测绘与影像资料，二十世纪初叶的外国建筑设计师们，也热衷选取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加入到自己设计的新建筑之中，这也让上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批有着浓厚“传统风”的钢筋水泥建筑。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将中国传统建筑“超越性的美”，理解为一种“意”，这不是眼见的，而是如同诗意的“建筑意”，或禅宗中的化境，一种超越性的感知。再如童荷先生考察苏州园林时，“每人名园，低回吟嘘，忘机终日”，也有相似的“建筑意”的体验，忘乎所有，融入其中。这种艺术精神来自中国博大的传统，而经由建筑传承下来（查明《中国近现代建筑与建筑教育》）。今天包括王振复先生《建筑中国》等书讨论人文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建筑传统，无不受到那一代学人的影响与感染。

今天中国古典建筑的研究者与爱好者们仍是幸运的，在建筑学读物丰富的同时，古代建筑作品同样存有不少。所有建筑都是寄托精神活动的载体与物质空间，来到古典建筑中，才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历程；建筑史学家们的人文主义思考，可以与所有走近那些中国古建的爱好者产生共鸣。纵然所有建筑都会消失，物质不会永存，人的体验或记忆也是一样，但每一代人都都会本能地将记忆向上追溯，透过建筑，形成人文的历史与体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图题：故宫脊兽 资料图片



西译的“复照”

王春

中一个平平无奇的地方，但温伯格提示我们：“鹿柴，是一个地名，与伊利诺伊州地图上的Deer Grove（鹿林）意思差不多。可能暗指鹿野苑，那是佛经里释迦牟尼初次布道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弗莱彻将其翻译为The form of the Deer，显然是希望在西方语汇中还原这种多义性，所谓的“鹿之巢穴”除了是鹿的休憩之地外，也令人想到：“弗莱彻以form的巢穴来对等‘柴’，同时暗用了另一个意义，柏拉图的‘理念’。这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理念。现实里的万事万物都是完美理念之有与投影。”尤其是参照他对复照青苔上令人困惑的处理——And in their reflection green mosses appear，也隐约流露着柏拉图意味的尝试：“如果their（它们）指青苔，那么appear（显现）的就是青苔自身（理念）的映照”，他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力图还原原诗中的这种哲学意味。

而力图呈现王维诗作与佛教关系的译者，往往将标题译为Deer-Park Hermitage, Deer Forest Hermitage, or Deer Wattle (Hermitage)，特别标明的Hermitage（兰若）引人注目，这一佛教词汇常指寂静之处或空闲之所，后来多被用作佛寺的代称，这种翻译凸显了王维诗作中的佛学内涵，只是在王氏笔下此种意境是如坐入水的消融式体会，禅境似乎若有若无之间，作者着重以风景描写流露禅意，而译者对Hermitage的强调固化

了原诗的隐约感，便少了几分淡淡的韵味。

当然，也有译者聚焦于“柴”而非禅意者，如The Deer Enclosure便是颇为西化的直译，enclosure具有圈占性，突出了西方式的人工性和目的性，而“柴”字更多野趣。也有使用fence（栅栏）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比park or enclosure更为贴合原意，后来的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便继承了此种翻译策略。这些对标题的不同译法，无疑可以增进我们对“鹿柴”一词的理解。

再看开篇的“空山”二字。过去，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幽深少人的山林”，这在唐人笔下颇为常见，如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白居易《香山寺》的“空山寂静老闲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均是此种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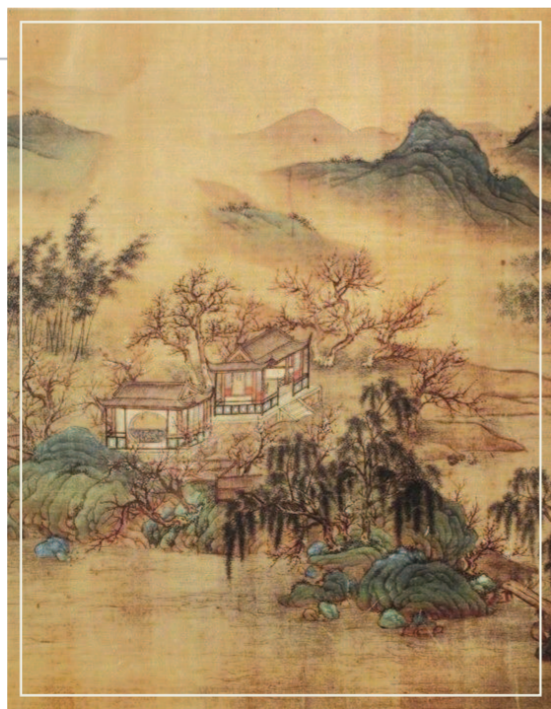
但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空”的复杂含义，它可以指一种似乎无所所有同时又可以有所有的状态，即在虚实有无之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佛教传入，它可以指涉“万物从因缘生，没有固定，虚幻不实”，即《维摩经》所说的“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间“空”与“色”的关系便颇暧昧含混，复杂难辨。同时，在本土语意上，道家也常用“空”来代指虚静之性。因此，汉语“空”常常未必真“空”的玄妙意味，进入西方语言体系后，则颇难找到对应的表述，首

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这种“空”的山，究竟应当“空”到何种程度？

一般的译者常常以empty hill/hills or empty mountain/mountains来指代“空山”，且不说hills与mountains之间有“山丘”与“山岳”的概念区分，即empty所代表的with no people or things inside还是显得过分质实，终究与汉语“空”的多义性有所差异。与此相似的是deep in the mountain wilderness and deserted hill的译法，在这些文本之中，哲学式的“空山”转变为了实证式的“荒山”，弱化了原作的禅理性，宇文所安的译本也是这样处理的，只是用了复数形式的deserted hills，使诗歌描写的景象似乎更为荒凉和模糊。此外，也有译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用So lone seem the hills and lonely mountain来指涉空山，但“寂寞”的情感性多少冲淡了王维诗中以佛道思想为精神旨归的超然意蕴。可见在西语世界中，如何将这种空得恰到好处的“空山”意味表述出来，是颇为困难的。

确实如艾略特·温伯格提示我们的：“完美的对应是罕见的。”翻译成诗与原诗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裂隙，而这些裂隙本身颇具价值，通过对它们的凝视，有助于我们发现诸多过去由于阅读惯性所忽略的问题，进而重新感受和体悟古典诗歌用字造句的精微。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元·赵孟頫临王维辋川图（局部）现藏大英博物馆

本中的注解也往往延续前人，即仅对“柴”与“返景”略作说明，总之，在中文世界中，我们认为即使对小读者而言，它也是一篇明白如话、毋庸过多解释的作品。

然而，恰恰是被视为文字简单的《鹿柴》，经由语言转换后，便仿佛字字都滋生出了问题，流觞自然的诗句在翻译过程中凸显出其微妙与复杂之处，不同译者的处理方式唤起我们对耳熟能详的语言重新加以审视。艾略特·温伯格《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中枚举了此诗的不同西译版本。

不妨先看译者们对标题的处理。按照过去常见的解释，“鹿柴”自然指有篱障栅栏的养鹿之所，是辋川